

# 《思虑20世纪》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思虑20世纪》

13位ISBN编号：9787508653149

出版时间：2016-1

作者：[美] 托尼·朱特,[美] 蒂莫西·斯奈德

页数：504

译者：苏光恩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思虑20世纪》

## 内容概要

## 作者简介

###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痾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巴黎、维也纳和哈佛大学担任过研究员。他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浩劫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等。

### 【译者简介】

苏光恩，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现任教于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 《思虑20世纪》

## 书籍目录

序 蒂莫西·斯奈德

第1章 此名依旧：犹太质询者

第2章 伦敦与语言：英国作家

第3章 家传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4章 国王学院与基布兹：剑桥犹太复国主义者

第5章 巴黎、加州：法国知识分子

第6章 理解的一代：东欧自由主义者

第7章 统一体与碎片：欧洲史学家

第8章 责任的年代：美国道德家

第9章 平庸之善：社会民主主义者

跋 托尼·朱特

讨论到的作品

索引

译后记

# 《思虑20世纪》

## 精彩短评

- 1、我应该40岁再来读这本书，因为我不知道阿伦特、阿隆、萨特这些人的思想，阅读的经历太痛苦了
- 2、应当作为枕边书的一本对话录，因为在接下来的大多数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似乎都需要不时停下来，看看托尼-朱特怎样说。
- 3、朱特生前的访谈录，读下来超预期。每个章节对应朱特的一种身份，围绕这个身份谈20世纪的人和事，很好看。
- 4、大师的一生和思考
- 5、非常值得一读
- 6、從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到社會民主，從劍橋、巴黎、波蘭到紐約，他總是置身於每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但又彷彿置身事外，用東歐猶太式的局外人之眼凝視遍地沈屍的歐陸，在猶太民族的根上長出世界主義之翼，這是一位20世紀自由主義者最後的人道呼籲，一位史家臨終前嚴謹又熱切的思想告白。
- 7、只评论翻译：  
翻译有很多问题。前言第一句话就不通顺。因为对托尼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所以硬着头皮读了。
- 8、看到《纽约时报》上朱特遗孀关于这本书撰文：“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不行了让我去哭一哭T\_T
- 9、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
- 10、K500/18
- 11、一个犹太少年的晚年
- 12、其实此书更有趣的是在片言只语中透露的消息，对人物的臧否，粗粗一读，很难全部吸收书中的信息量，可以经常性地对照阅读。可以作为一本20世纪欧洲思想史的索引与指南。缺点是对中国的思想史少有顾及，作者无暇他顾，也能理解。
- 13、托尼·朱特的回忆录，这不是他亲笔手写的一部书，而是与同事合作的一部对话录。这部书与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有着顺承关系，如果你仔细阅读本书的主题，就会发现他们将二十世纪作为反思的对象，并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都是欧洲到英国的移民，都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运动，而且都以欧洲或者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朱特的写作更个人化，有思想是写作的特征，但是我个人觉得朱特的写作更加接近于思想史，而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写作。在这部书中，朱特反复强调了马克思或者共产主义运动与欧洲乃至社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血脉上的，虽然朱特与霍布斯鲍姆那种深度参与不同，但是他们两个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都是令人动容的。书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朱特在美国的学术生涯，欧洲与美国的对比频繁出现，这也是史学家喜欢比较的特点。
- 14、2016.09-2016.12 这才叫真正的知识分子！打算看战后欧洲史！
- 15、看一遍是不行的
- 16、斷斷續續讀了大概一個月吧，受益匪淺的一本書。比較適合讀完朱特的大部分作品再來看，需要補的歷史比較多。第六章東歐知識分子談得相當好，第八章美國尤其當下語境讀。
- 17、朱特在生命尽头最关心的不仅是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思虑20世纪”，还有在面对全球化、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复杂问题的21世纪时，我们如何“避免更坏的世界”。
- 18、精彩纷呈
- 19、托尼·朱特的2016-5-24
- 20、托尼·朱特和同事斯奈德合作完成的对话录，将朱特自己的生平经历，和二人对于20世纪诸多重大命题的反思巧妙结合在一起。由于朱特的犹太背景，以及在他出生时，20世纪进程已经过半，因而这本对话录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比如着重分析了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复国运动和东欧二战后历史政治变迁等内容，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大屠杀之于现代性，东欧变迁之于社会主义和二战后世界格局演进，都具有全球层面的非凡意义。这种融个人生活经验与宏大历史叙事于一体的写法，跟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津津乐道的学术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 21、感谢译者苏光恩先生的尽心翻译！
- 22、读到最后竟有“美国人应该多看看”的错觉。恐惧的政治让人联想到最近的川普，对于历史知识

## 《思虑20世纪》

的匮乏反而容易被政治操纵，两者无法以一概全。朱特不愿意为其他人屈从自己的观点，言谈间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自信。对谈看的挺散乱的，前面的叙述反而看起来更加入心。

23、托尼·朱特的学养总是让人觉得概论至上缺乏自己的真知灼见，用一个复杂的犹太背景，加之宏大的理论结构，黑暗的感觉笼罩其中，其实啥也没有新知。

24、之前没怎么翻过朱特，现在看罢，真觉得他的逝世令人惋惜。他真是充满了真知灼见，对过去的欧洲与当今美国的论述都让人佩服。书后半部分提到了21世纪“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参照这几年发生在各地的恐怖袭击事件，朱特所怀有的情怀令人扼腕，他还指出了保守势力的抬头，美国目前参选中的川普先生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朱特似乎能穿透历史链接未来。

25、前面讲历史还行 后面讲经济部分显示左派对经济和社会运行如何蠢不可及 标准白左思想

26、比预想的好，很多值得回味的思考。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传，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何为更好社会”的一种政治关怀和思想历程。译笔也很流畅

27、欧洲犹太人的文化等级；作为必选题的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大屠杀问题对战后美国政治德性的腐蚀；美国大学无聊的文化批评和政治正确；哈耶克思想的奥地利地方知识背景及其错误；斯拉沃热·齐泽克并不存在；美国政治的腐化以及法西斯化的可能性；国家是必要的，福利国家是可能的未来；等等。

28、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思虑二十世纪》，其临终对话录。我一直有点看轻对话，直到经济人读书群的王前老师力荐下，今天开始看，真好看。托尼以历史学家成名，却自称历史是自学成才，他将历史看作智识介入与公民参与的路径，国人当心有戚戚。谈话有机锋，推荐。

29、阅读的速度会因为这样的书骤然慢下来。在智识层面它难以消化，而在个人层面，它提醒了我所向往的那种抽象的快感，以及自己身上难以克服的具体的懒惰。

30、社会越是民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便越是有限。

31、打算买一本

32、an orgasmic whirl of intellectual sound bites

33、只恨自己读书太少。翻译如果通顺一些会更好。

34、社民主义。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35、朱特男神！！

36、47f nom 56a tgf b roa noa yg tm lmg fa roa ea6f 5o6fb noa ea6f 9ma om6 roa pafb noa 7j dafb eam fa6f 9gfb 5omf pa6 n6f ea h7a b7 rogm na yg 9gm 96 5o7fb 46 9a6f ym noa 87f 5gfb f7y o76q7f 96g 57flj6d nl6lagf f6 46f omg 5o7 j6f ogm om6f 5o7fb 9a la7 96g lmg fa nmg r6a ea7 im l6 o7 ea6 j7f ta ia yg h7f oma r6a no6fb ym noa ta 9a6f ea6f ha6f

37、已藏

38、好好好，选得好，翻得不赖，内容10分。

39、只是一本自传

40、虽然读完了，但仍然觉得这本书值得隔一段时间拿出来再看一次。很少有书看了会让人觉得此生有幸读到，这本就是。

41、过去半个世纪欧洲智识生活绝佳的旁观者和引路人。

42、从少年往事到史学技艺，从犹太复国主义到东欧自由主义，一场贯穿作者生平时代状况和理念沉思的长谈。

43、前8章即前370页非常地道，深刻透彻且足够坦诚，无论朱特还是访者斯奈德，均见不俗功力；后70页则多东拉西扯，开始漫无边际跑题，猜测是朱身体状况恶化及斯准备不足双重因素所致，很多话题不只涉入太浅甚至观点极其突兀、荒谬，一叹。综合看，是本值得细读的好书。译文也地道。译后记则冗长啰嗦傻B至极，完全可直接砍掉。

1、托尼·朱特是东欧犹太人移民的后代，1948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为了纪念表妹，所以给他起了托尼的名字。尽管如此，他的父母并不希望他回归犹太教传统，而是适应英国的生活。不过，显然托尼·朱特显然并不会因此而遗忘他的犹太人身份，特别是他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后，更是需要面对二十世纪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这更凸显了他独特的视角。2008年，托尼·朱特因病失去了工作能力，他的同事蒂莫西·斯奈德试图通过口述史的形式，为他编撰回忆录。朱特答应了同事的请求，从2009年冬天开始，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对话，这些对话显然是对《霍布斯鲍姆自传》的致敬，无论谈论的内容，还是书的标题都很接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霍布斯鲍姆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洗礼，所以他与二战后出生，生活在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托尼·朱特，对于二十世纪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虽然，两本书都是要反思二十世纪，但是因为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所以结论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回到托尼·朱特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由于朱特出生于1948年，相对整个二十世纪来说，已经过去了一半，而思虑二十世纪，就不能不考虑到之前的历史，因此这部书就出现朱特通过历史学来回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成为了他家族与民族叙事的历史背景，通过这种方式，他完成了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回顾。托尼·朱特的祖父是华沙的犹太人，不过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东欧，犹太人的身份显然没有带来更多的好运，波兰以及东欧的居民，对于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敌意，而朱特家族不得不迁徙到东欧，朱特的父母移居到英国，而他的表妹则移居到比利时，在二战中被德国人带进了集中营。父亲朱特起了托尼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死去表妹。朱特的犹太身份，从此就注定影响其一生。除了犹太人身份外，还有一个历史背景，也影响到朱特对于二十世纪的思考。与霍布斯鲍姆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朱特出生在冷战时代，此后不久，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秘密演讲对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西欧的共产党员在了解到斯大林清洗内幕时，纷纷脱党，甚至霍布斯鲍姆也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变成了同路人，而不再主动参与。受这些环境的影响，托尼·朱特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好感，因此在他撰写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往往采取了雷蒙·阿隆的视角。在《责任的重负》中，他完成了对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速写，对于二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谬误、文人气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冷静和理性的阿隆青眼相加，认为他对于左派的批判，恰中要害。在撰写完这部书后，托尼·朱特回到了英国，接受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的教职，这种幸运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希特海姆阅读过上述托尼·朱特的博士论文后产生的。恰恰是这种幸运，让一位自学成才的博士成为了历史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朱特的读书经历。托尼·朱特在剑桥读书期间，更多是读书和讨论，与当时的老派、自由主义的英国经验主义史学家，也有对方法论十分敏感的思想史家，还有一些是属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旧的左派经济史学家。这种读书和讨论，自然能够打开一个年轻人的学术视野，但是却无法帮助他构建出正确的学术研究道路。他只好自己跑到图书馆，去寻找自己认为有用的著作进行研读，并模仿书中的议题和资料之间是如何论证的。这种方法让他在法国乡间的档案馆，搜索一战后法国的出版物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让他能够顺利写出博士论文，并公开发表。托尼·朱特的作品，让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名声鹊起，美国的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不过，朱特却拒绝了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反而定居在纽约，在纽约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在他看来，纽约更接近于欧陆的氛围，整个城市容纳了记者、艺术家、游客和当地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纽约的大学是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氛围之中。这让熟悉欧洲知识分子的朱特更有归属感。生活在美国的朱特，自然将注意力放到了美国自身的问题上，特别是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让朱特对于美国的日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探讨美国自身的价值与运作机制。这虽然，都曾经是欧洲研究的问题，但是朱特将其转移到美国，自然也不太费力气。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于美国氛围的疏离，特别是对于美国话语中的犹太人及其大屠杀的话题，认为这是美国在消费这一问题，而不是对犹太人的处境有真正的感触。在跋语中，朱特显然意识到，回忆二十世纪与自传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从历史著作中获得的经验与自己经历之间存在某种落差，这种落差反映在他的对话中，就会体现的非常明显。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历史学家的朱特，他的历史回顾与评价，是建立在他的经历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某种普世的观念下。因此，我们在阅读这部回忆录，会感觉到他对于时代和人物的评价，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视角。换句话说，这部书是朱特眼里的二十世纪。

2、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文/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译/宫保鸡丁我嫁给了托尼·朱特。当他面临ALS（也称卢·格里克症，即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痛困扰时，我们和两个孩子在一

起生活。从2008年他被诊断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这长达两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难写下三本书。在《沉痾遍地》和《记忆小屋》之后，最后这本《思虑20世纪》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在确诊后不久，托尼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短短数月内他已四肢瘫痪，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但他依然勤奋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和蒂姆终于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本书记录了20世纪思想史，以托尼对犹太理想主义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的反思为开端，以他对美国政治在后冷战世界的失败的惊人描述为结尾。我们也能勉强把本书看做一部精神自传，说“勉强”是因为托尼几乎不以第一人称写作，本书所有自传性内容都是后来插入的——几乎是不情愿地——因为那些观念、历史、政治和伦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个人色彩。对托尼来说，观念是某种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数人在乎悲伤或爱之类的情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开端——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亲的表妹托妮（Toni），年轻的托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长大后，他父亲将自己对左翼政治和东欧历史的热爱传给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岁生日礼物就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对他来说，观念以及对历史解释的需要根深蒂固，贯穿着他的过去和这本《思虑20世纪》。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需要对这本书做些解释——背景介绍或场景描述，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太灰暗了，正是这种灰暗造就了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我对《思虑20世纪》有一些话要说，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读者知道的。当托尼被诊断患有ALS时，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在所有医生告诉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当我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他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扩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尽，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每天都带来坏消息，难以承受的结果接踵而至，这一切混杂着困惑、决心、怒气、悲伤、绝望和爱。某种意义上，大约就在他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泡影世界”（bubble）。这个世界类似一个平行世界，我们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存在透明的、薄膜似的围墙，它们更像是单面镜：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但外人无法看到里面，至少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深知这个世界奇怪而分裂，支配世界的是病态和死亡的法则，而非生命的法则。有时候，当我散步或仰望天空时，我能穿透这个世界的围墙。但托尼不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当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变得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他不能控制的，从呼吸机的电源插座到轮椅，以及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投来难以忍受的善意。他只能把书房当作避难所，而封闭的、如监狱隔间一般的病房只能安放他衰弱的身体和被困住的头脑。他越是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他就变得越有公共性。对他来说，和亲友相伴的私人生活是最大的安慰，同时这也非常令人悲伤，因为托尼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个过去的自己——他称之为“老托尼”（the old Tony）——不断纠缠他、使他蒙羞。但也有一些地方能让他感觉自在——在那个世界的入口，他走出“泡影世界”重新做回自己，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比如邮件和互联网这个虚构的空间，又或者是文字和记忆。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托尼能够坐在电脑前，我们代替他的双手，向世界传达他的文字和思想。尤其要感谢托尼杰出的助手尤金·卢森尼亚（Eugene Rusyn），他隐去自己的存在，以和思考、谈话同样敏捷的速度做着记录。因此，托尼才能写越来越多的文章，接受越来越多的邮件采访或其他远程采访。《思虑20世纪》也是此种结晶，即世界的入口。过去依然是托尼的思想源泉——并非是“历史”，而是“记忆”。记忆是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物，他就像紧握救生索一样紧握记忆，这也是疾病唯一不能从他身边夺走的东西。记忆是托尼逃离“泡影世界”的唯一方式，也是他至死保存的一种独立性。在调取这些记忆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记忆就保存在他的大脑里，只要他还能与人交流，他可以一直使用这些记忆——这些他的记忆。这就是为何《思虑20世纪》是一本有关记忆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尽管20世纪是本书的研究主体。这本书和托尼的其他著作不一样，没有从数以百计的泛黄纸页中收集到的大量注解、参考文献、资料、图表、事实和信。《思虑20世纪》一直存在托尼的脑海中。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20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当他的同事和朋友，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对话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计划中的书变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虑20世纪》。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我经常在厨房听他们的交谈，每次都为托尼的广博和宏大的视角而震惊，尤其当他谈到世纪之交纷繁错杂的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战后右翼民主政治的命运时。我对托尼的渊博和自如的控制力习以



为常；而现在，他毫无障碍，畅所欲言。这是一次知识的洪流，所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蒂姆坚持认为托尼不止是在“说”20世纪，更是把他自己放在这个时代背景里。比如说，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犹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予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托，他再一次回顾了他曾对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深深的热忱，而他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在他加入基布兹并主动成为“六日战争”的志愿翻译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使得他“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的灾难时多了一些历史的同情。对托尼来说，完成这本书的动机（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适和绝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阐明思想史。蒂姆深知这一点，当他们的谈话进入状态的时候，托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饭、涂写甚至呼吸，他的身体饱受瘫痪的苦痛；当他和蒂姆谈话时，竭尽各种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寻回一些慰藉和欣喜。这其中有蒂姆的功劳，他的严谨，他的知识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个方面激发托尼做到最好。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当托尼病得越来越重，这本书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他花了点时间回顾旧作，比如他在2003年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一国解决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坚持认为当代政治专家误解了哈耶克关于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观点，忽略了当时奥地利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背景，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即“奥地利的经验……被升华成了一种经济理论”并且“不仅影响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影响了当代美国有关公共决策的讨论。”蒂姆会根据他们商量好的章节大纲把对话整理成本文，然后把草稿发给托尼。之后，托尼和他的助手不断打磨文本，这项工作往往进行到深夜。文本并不总是托尼想说的话，确切来说他为文本里缺少他的声音和一贯的优美行文而困扰。他曾是一个作者，而将谈话直接转录成文字——哪怕经过数小时辛苦编辑——对他来说仍然是怪异而缺少平衡的，尽管他具备出口成章的能力。诚然，这本书最后呈现的结果是托尼和自己的妥协、托尼和蒂姆的妥协，以及托尼和ALS的妥协。这仅仅是本书的价值之一，我认为它还象征着托尼最后一次记录下自己的思想的决心。尽管本书有自传的成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托尼的忏悔自白：出于保护他们和自己远离公众关注的愿望，托尼谨慎地绕过或略过了他最关心的人。他从来不记笔记，也从来不会写下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思考。也许部分原因是他非常注重隐私，托尼一直为他即将离世而感到痛苦，并非对死亡本身（他和任何现实主义者一样坚强），而是对两个儿子感到抱歉。他太想教导他们，去爱他们，在儿子们成人前一直陪伴他们。他去过哪里，他认识什么人，他读过（写过）哪些书，他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托尼有太多故事想告诉儿子们。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自身的设定超越了死亡的局限，找到一条从深渊“回返”的路。那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托尼的想法，但现在我意识到死者也能跨过重重阻碍表达思想，将生命和死亡彻底剥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真正死去之前就开始考虑此事，我们才能做到这点。托尼做了这件事。他迅速失去了对生命的控制，但讽刺的是他还能牢牢掌控身后事。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留下的亲朋。我们所说的并非某些超自然事物（尽管有时我们也会谈到这些），而是有关历史的文字和记录，托尼深知他写下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思虑20世纪》就是他为那个无法再分享的未来留下的一份努力。而书中的自传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丹尼尔和尼古拉斯（译者注：托尼·朱特的两个儿子）。这本书是在那个“泡影世界”里写成的，隐约存有那个世界的痕迹。未来，以及托尼的计划和我们一起想象的生活就这样被突然抹去。过去也改变了，每段回忆都成为一个令人悲伤的注解，提醒着生命正逐渐离他而去。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人们承认自己无法预言遥远的未来，但当下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变得如何，但多数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么。对托尼来说，这一切突然颠倒了。未来——甚至是不久之后的未来——变得无比清晰：他将不久于人世。然而，现在却变得不可预知。今天他的手臂还能动吗？他还能呼吸吗？托尼脑内的定时器，这种令人不安的“红移现象”（译者注：红移现象，最初是针对机械波而言的，即一个相对于观察者运动着的物体离得越远发出的声音越浑厚，相反离得越近发出的声音越尖细。）也改变了托尼的政治观点。所有事情都变得紧急起来，当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激进，我和他都认为《沉痾遍地》里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不平等的论述，关于社会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观点，以及其他论述，使这本书称得上他个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在《思虑20世纪》中，托尼对正义的思考更加超前。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

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耻辱是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触时，这种情感最为强烈。这其中许多人比托尼年轻，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医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实际的社会和医疗服务。耻辱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同时也是——或者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文章《夜》（译者注：本文收录于《记忆小屋》）中写道的这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部分是为了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思虑20世纪》——托尼尽力攀登的高峰——的终点，为了我们能够“思考社会”——使人们不再仅仅考量社会政策的财政效益。但这并非残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这是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义务。当他快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于呼吸道问题和注射吗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时间有限而无法预知。疾病对托尼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样痛苦的还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发生了任何让他对世界更加忧虑的事情，他几乎难以承受，随时可能离去。就拿他在这本书最后对我们时代——“恐惧的时代”——的讨论来说。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的恐惧，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可能出现投下炸弹的陌生人的恐惧——政府无法再掌控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对此深感恐惧。这种恐惧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孤立团体，这样一切都会失控。我想美国人深知这种无能为力为的恐惧，当他们意识到曾经远离恐怖主义的人身安全不再时，恐惧感被加强了。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恐惧是一种终极的情绪，托尼一直与之相随：恐惧自己无助地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恐惧呼吸机突然失灵（如果真的发生了，在那之后还是会恐惧再次发生）；恐惧被陌生人把导管塞进鼻子和喉咙（他一直希望是我来做这件事，即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对死亡的长久的、无法忽视的恐惧。在托尼看来，对恐惧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样，是最严重的道德滥用。面对社会不公，托尼一直是一个坦率的批评者，如今他对此更是零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折中解决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对政治欺骗和在智识上的不诚实的零容忍。某种意义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为什么人们没有更生气呢？当然一些人确实发起反抗，托尼没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原本是他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这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在他看来，这恰好证明了试图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的失败。这种划分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原则的背弃（*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试图通过清晰的授课、思考和写作来弥补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军奋战，而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思考就根植于这种孤独感中：远离知识分子群体，坚守原则，不加入任何组织或派别，同时独立地衡量某个事件或问题，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任何宏大的蓝图（他支持对波斯尼亚的干预，但反对出兵伊拉克）。事实上，疾病给托尼带来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当他口述《思虑20世纪》时，他失去了他的学生、他的教室、他的书桌、他的书本，他不能再到处旅行或散步。换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帮助他厘清思绪的地方。也许其中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阵地：他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对生命的实际存在感到疲惫不堪。写作包含了身体的动作——通过笔、纸、键盘——将思想传达到页面；写作是有韵律、感觉、姿势和节奏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搏动。但是托尼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或者说被严重削弱了，这种迷失感原始而深切。如果没有疾病，一切又会如何？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他确实在公众场合中“自言自语”，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邮件、采访、博客等电子形式不断回响，继以评估它们的影响。他借此融入这些场所，指导这些人们。“他们”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过赞美，而是通过争论。这很重要，因为公众构成了他的写作场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锋对象——这才是他最终对手。让疾病、命运、身躯、过去和未来都见鬼去吧。托尼可以让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不断增加论辩的难度；他面对的公众会回击——当你在战斗时，你才感觉自己是在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这就是为何他坚持完成《思虑20世纪》的理由，这本书是战斗的一部分，从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到他充满先见之明地捍卫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纪律，即时他在战斗时处境险恶，他依然坚持下去，说出那些必须说的话，精炼和打磨每一个字。这才是他唯一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思虑20世纪》包含了多年的思考和学识，也包含了长久的病痛折磨，最后成就了一个终生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维持这种理想主义需要保持极度自律的头脑，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我并不是说托尼相信有一种所谓理想的社会，他唯一保持理想主义的领域是严肃的公共辩论。除了爱，这是疾病唯一不能夺去的。托尼称它是“核心”；对我来说，无尽的黑

暗把托尼和我们分开，而这是一束微弱的光。如果说《思虑20世纪》涉及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之间的无人岛屿，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完成过程中除了黑暗相伴，还有点点光源。两者包围了这本书，就像托尼一样。如果你能，请想象一下，当他快要完成本书手稿时，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浑浊的空气和永远擦不干净的灰尘，浓重到几乎可见的杀菌剂、鲜花和吗啡的气味，扩音器里滋滋的电流声；保持空气流动和光线敞亮而打开的窗户，因为托尼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不得不再关上。就在这个书房里，托尼完成了《思虑20世纪》。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快要失去所有行动能力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公众任务——他是这样看待这本书的——竟然是编辑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思虑20世纪”这个书名并不精确，不过已经“够好了”。对什么来说够好了？对谁来说够好了？当然，对丹尼尔和尼古拉斯来说是这样。也许还有他所面对的公众，还有那个为了留住他而做了很多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疾病改变了所有事情——但没有留下任何改变的印记。托尼的文字终止于2010年7月5日，他于8月6日去世。原载于《纽约书评》2012年3月22

日<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3/22/tony-judt-final-victory/>有错都是译者的锅，请多指正【顶锅盖跑

3、托尼·朱特（1948-2010）是当代最为卓越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成长于英国伦敦，是二战后西欧福利社会的受惠者，而他也因此树立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朱特先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师，而后执教于纽约大学，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法国史、战后欧洲史、20世纪思想史。他对于欧洲联合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衰演化等重大命题有着独到和深刻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而写成的《战后欧洲史》，被认为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所写成的、描绘了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面貌并解释了相关原因及影响的最佳作品。朱特2008年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简称ALS，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患有此症，2014年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就旨在唤起全社会对ALS的重视），2009年颈部以下瘫痪，2010年去世。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朱特的挚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东欧史研究专家蒂莫西·斯奈德，在2009年，即朱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探访朱特，以后者就专门话题展开讲述，然后启动两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再由前者整理成稿的方式写成。可以认为，《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一本宝贵的作品，以抢救性的方式写成，向人们传递出一个生命接近终结但思想水平臻于圆融纯青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这本书紧紧围绕20世纪国际政治、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的重要命题，穿插对朱特本人个人成长及学术生涯的介绍。书中所涉及命题包括，犹太问题、德国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战后清算与重建）、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20世纪在欧洲的兴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东欧复兴、凯恩斯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蒂莫西·斯奈德说，写作这本书，以传记+思想史的混合文体，旨在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理解21世纪的一项关键的智识挑战：“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朱特本人是居住在英国的中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他也一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问题是他生长过程和学术历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但成长在英国的朱特，犹太意识的萌发是在青年时期才出现的，英国迟至二战之后，民间的反犹情绪依然浓厚（英国民间并无德国二战期间反犹的历史负担和道德束缚）。朱特也指出，在二战前后，不光是德国，中东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默认反犹主义的存在。这证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确存在超出德国的、更具广泛性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这跟19-20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潮流有关，尽管各国的犹太人群体都努力融入所在国，却依旧因其更强的组织性和相对独特的种族习俗而被视为异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战前存在的奥匈帝国，王室扮演了犹太族群的保护者，而在一战之后，犹太人就再也找不到之前日渐衰微的保护，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大国强权的存在（二战之后同样如此），感受到普遍的不安全感，寻求安全感也驱动出一轮又一轮反犹思潮。犹太人尽管发明出“一套关于自我欺骗，必要的受苦和衰颓，以及随后出现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克服，再到最终痊愈的叙事”，却依然难以摆脱饱受挤压的存在。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深化了二战战后欧美民间对于反犹历史问题的讨论，也迫使之前那些试图把从众为恶责任推托得干干净净的人们重新反思。在那之后，反犹被定义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正确和不道德，才正式成立，多元包容渐渐为公众接纳。当然，多元包容的理念，恰恰也促成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接纳更多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移民，允许其保留原有族群的生活方式，而这成为了21世纪初席卷欧洲社会的不稳定潮流的来源。犹太问题就是这样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及之后历史演进的方向。20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发生了历次分化

，不但有沉浸于日不落帝国“光荣传统”的老派知识分子，也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其中又以看待苏联的观点分歧，出现了更细的划分）的分流。在二战正式打响之前，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法国及部分北欧国家的知识界，也有着大量的拥趸。这些分流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变革、社会危机，当时的知识界已经很难形成一套具备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争论之中，更具激进意味的论点都更可能吸引受众，更可能在公众舆论议程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传播，而这反过来又将促成争论观点的极端化。在朱特看来，法西斯主义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代人在面临战争，以及战争残酷性表现出的不确定感。祛除不确定感，才能获得安全感，为此可以牺牲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权力，为扭曲的国家主义登上舞台提供便利。而法西斯主义的大行其道，跟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善于批判现象、提出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从而丧失了民众信任有关。在今天的欧洲，中东移民的大批到来，引发了大量的骚乱和不安，为此包括德国等二战后原本已经有过深切反思的国家，类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又重新涌现。东欧国家二战后被动的成为苏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附庸地位事实上冲击了这些国家对于苏联式意识形态的信任。冷战后的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图谱中分布远比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还要偏于右翼，美式自由主义因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才是欧洲人普遍想要的欧洲？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得不出一个权威的、统一的答案。关于欧洲史、冷战史以及具体各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在各国的社会、教育、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版本各不相同，这实际上才是欧洲迄今难以整体捏合的主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因为苏联阵营的解散，东欧国家整体性的进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偏右，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为民族主义神话提供合理性依据的工具，“抹消过往，或为了无关的目的而利用他们”——这种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自一开始就存有无法修复的硬伤。知识分子最应引起警惕的，其实不是政府如何如何（做了什么）、应该如何如何，而应意识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化，历史本身的主观性被增强，历史学家等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受众，会努力“重写”历史。一些历史读本为此成为了煽情+造假的格式文本，也不管是否深刻到位，肤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受到青睐。正因为此，从各国的政治家，再到普通民众，因为不具备最为基本的历史素养，会表现得轻易接受谎言，就像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小布什政府给出的拙劣开战理由和证据深信不疑，而大众也同样因为可以看到现场直播的战争欢呼雀跃。与之同时，因为经济学理论和逐利思维渐渐主导了人的观念，普通人在讨论政治、国际关系问题时，也仅仅着眼于利益：打一场战争是否划算，制裁某个国家会带来还是损失更多利益。当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形态，成为主导20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也非常轻率的接纳了非此即彼的意识观念。美国的农民、工人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却很少提及他们之所以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空间，恰恰源自大政府逻辑下的补贴。朱特不无讽刺的指出，个人自力更生已经成为全球性神话，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能维系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接受公共产品的同时，继续尖锐的反对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原载于界

面2016-05-30<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71115.html>

4、1、渐冻人托尼·朱特前两年冰桶挑战风靡一时，人们由此知道了“渐冻人”的存在。所谓渐冻人，是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得这种病的人，肌肉逐渐萎缩、无力，最终导致全身瘫痪、呼吸衰竭而死亡。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得了它只能慢慢地等死。托尼·朱特就是这样一个渐冻人。斯蒂芬·霍金也是，但霍金的“冻结”过程慢得多，现在还活着，托尼·朱特的病发展得很快，2年的时间就彻底“冻结”了。本书的访谈人蒂莫西·斯奈德描述了这一个“渐冻”的过程。为了完成这本思想对话，斯奈德与托尼·朱特共同度过了三个季度的时光，冬天、春天、夏天。2009年1月份的时候，托尼还能行走，那时他已经无法转动门上的把手，但是还能站在门里面欢迎斯奈德。到春天的时候，托尼的头部已经被呼吸器包围，肺已经无法工作。夏天，托尼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经几乎完全无法动弹。托尼·朱特与家人这是一个多么残酷、折磨的过程。斯奈德说：“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进程，着实令人难过”。然而托尼·朱特又熬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在2010年8月逝世。在逝世前一个月，他为这本书写了跋。介绍这个过程令人唏嘘。我相信本书的每一个评论者都无法绕开这个过程，当你读那些清晰、富有洞见的文字时，尤其是读到托尼·朱特逝世前一个月所作的跋时，想到这是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正在不断萎缩的人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它依然逻辑缜密、条理清晰，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2、游离于局外的局内人但我们还是要将视线转回到书的内容本身。托尼·朱特的声誉并非因渐冻人而起，他早已因自己对欧洲史的研究而享有盛誉，被誉为当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巨著《战后欧洲史》被视作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在他的身上，有着多重的身份。他出身于祖籍东欧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在英国长大，接受英式教育，但

家族信奉马克思主义，受家族影响，托尼·朱特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青少年时代，他也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剑桥念大学，在巴黎高师念研究生，研究法国知识分子，毕业以后回到剑桥的国王学院任教，然后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辗转，先后任教于伯克利、牛津等多所名校，其间由于结识东欧自由主义者而一度对东欧史产生兴趣。最后定居纽约，担任纽约大学教授、系主任，开始公共写作，写出《未竟的往昔》、《责任的重负》、《重估价值》等一系列著作，写作《战后欧洲史》，创建著名的雷马克研究所提携年轻的学人。可以看到，这份经历里面对应了多种思想身份：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东欧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美利坚的公共批评家，还有他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他与斯奈德的思想对话，就是围绕着这些思想身份而展开。左：托尼·朱特 右：蒂莫西·斯奈德具有如此众多的思想身份，而且对每一个领域都能有深刻的观察与批评，他是如何做到的？斯奈德提出了这个问题，朱特的回答是：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身份之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这让我想起雷蒙·阿隆所说“介入的旁观者”，以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视角去介入，似乎更能触及事件的真相。但托尼·朱特并非旁观者，并非局外人。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留下了重量级的作品，他对自己曾经深入其中的思想都有杰出的批判。所以斯奈德说：“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然后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

3、投入而疏离读这些对话的时候，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托尼·朱特身上那种独立思考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这种能力让年轻的托尼在接受一种思想的时候，不会过于投入，不会将其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全盘接受，而是始终保留有自己的一种清明理性，一种质疑的精神，帮助他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外衣而触及真相所在。他在青少年时代一度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两次到以色列参与基布兹劳动的经历很快让托尼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丑陋之处，它的沙文主义倾向，狭隘与排外，短视和狂热，令他很快产生了厌恶之情，从此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局外人。并且，这段经历让他对狭隘的排他主义倾向终生保持警惕。朱特家族出身于东欧，祖父一代起就是社会主义者，父亲是英国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托尼·朱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家传，少年时代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幸运的是，他所接受的是“冷战岁月里有异见的左翼教育”，对于苏式的共产主义抱有警惕和反感。相对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托尼·朱特尽管参与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但这种参与反而令他对激进产生了怀疑，因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演说才会在年轻的托尼心中产生共鸣：“最吸引我的始终是那个善于分析的卡尔·马克思，那位政治的评论家，而非革命的预言家”。这种投入而又保持疏离和超脱的状态，或许就是托尼·朱特说自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的原因。之所以能如此，原因首先在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与家族传统（犹太、社会主义）之间的天然张力，英式教育中潜藏的英国性在托尼日后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托尼自己所说，“使我这样的人能够很自然地 from 激进的青年政治观游回到后来的自由主义主流里来”。

4、从法国、东欧到纽约这个回归的路径，经历了托尼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经历了他发现、寻觅、回归东欧的过程。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东欧，但直到与东欧的知识分子如扬·格罗斯等人接触之后，托尼才意识到自己“对另一半欧洲历史的无知”，意识到东欧政治经验对于整个欧洲的意义。当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拥抱左翼，为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的时候，东欧的人们正在一步一步陷入威权政治的罗网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东方的幻觉，要到1968年的布拉格才彻底破灭。而此时东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在无法反抗权威，也无法与之有效谈判的情况下，正在“行动”，他们将一切虚伪的言辞、法律看作“像真的”（as if）一样，严肃地予以对待。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选择，也是一种真正“介入”的政治，这种“介入”无法旁观，而是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参与者知道那些法律和言辞的虚伪，却不将它视作虚伪，而是以“明知为假、待之如真”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那虚伪“弄假成真”，让那矛盾和谎言显露于世间。托尼由此发现了东欧对于欧洲的意义。当西欧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在70年代陷入危机的时候，东欧异见者的政治经验提供了另一个自由主义的源泉，因为在那里，“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无须审视的政治默认状态，而是一个需要相当的个人风险才能获得的激进目标”。由东欧国家的政治经验出发，托尼·朱特重新理解欧洲，奠定了他写作《战后欧洲史》的思想基础。在其中，战后的欧洲不再只是欧盟崛起的历史，东欧不再是“俄国共产主义边陲”，而是作为整体的欧洲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学家，托尼强调还原历史真相，反对以当下的政治关切遮蔽历史，反对因某种价值追求、某种“真理”而歪曲、利用历史，但他并不否认历史与当下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学家在承担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之外，还有一种公民的责任，不仅要原原本本地书写历史，还要防止历史被滥用。因而，除了追寻历史事实，历史学家还应当建立一种历史叙事，告诉读者如何看待历史。这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在《战后欧洲史》中，托尼·朱特被批评“自以为是”，这正是因为他试图介入，基于自身的时代和环境，对于历史给出自己的阐

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公民责任，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托尼承认需要有一种叙事，但这种叙事如何避免扭曲真相？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张力的存在，这同样体现在他的公共写作上。“一个接受了某种更宏大的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的人，能否靠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诚本身来挽回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或一个人的声誉？”定居纽约之后，托尼·朱特积极介入公共写作，从历史领域扩展到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欧美外交政策等公共问题。他似乎要用自己的公共写作来证明宏大叙事真理和微小真相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并存。而且在公共写作上，他更注重的是后者。当回到某个具体问题之时，微小真相解构宏大真理的作用似乎更容易体现出来。在“911”之后，身为犹太人的托尼·朱特不为当时一边倒的舆论倾向所动，清醒地反对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他的理性和洞察力。2002年时的托尼·朱特5、精神世界与思想叙事尽管回归了自由主义主流，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托尼·朱特还是更多被视为一位左翼的思想家。除了历史印象的惯性作用，还因为他即使回归自由之主流，却仍然保持着疏离的状态，对自由的主流价值观发出诸多批判。托尼童年时代的记忆，火车，穿过伦敦的公交车，这些福利国家的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私有化，被消失，这种切身的感受让他持守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强调公共力量在平衡市场分化中的作用。有趣的是，托尼·朱特与以赛亚·伯林的立场大体上一致，都是中左立场，但后者几乎被看作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而托尼·朱特却从未享有过这一殊荣。他们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经历对自身的批判而投身自由主义，一个是从极权经验出发，经历对极权的批判而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自由立场。两人殊途而同归，颇有中道之风。托尼·朱特的思想在本书中的呈现是庞杂的，试图为其梳理一条清晰的路径非常困难。就像托尼说历史，“一种准确的杂乱无章比之优雅的谎言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一种杂乱无章的思想呈现更接近于真实的托尼·朱特。尽管如此，托尼·朱特仍然力图给历史一个前后一贯的解释和一条明晰的叙事线索，我们阅读托尼·朱特，也应当尽量给他一个清晰的思想发展路径，才能更好地理解他。2016年7月2日（《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蒂莫西·斯奈德著，苏光恩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

## 章节试读

### 1、《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页

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这个细节非常动人T\_T

### 2、《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97页

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这些意在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批判方法，其实是弄巧成拙。它们种下的是混乱而非洞见，而混乱乃是知识之敌。

### 3、《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6页

斯奈德：我始终觉得，犹太裔波兰人（Jewish Poles）、波兰的犹太人（Polish Jews）和身为波兰人的犹太人（Jews who are Poles）存在着一个规模问题，这也是波兰人整体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它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因此，其存在让人大为尴尬，与此同时，其他人又令人不快地对其视而不见。

朱特：除这一点外，波兰人和犹太人还有很多共同点。这里面有一种波兰—犹太式的习性——波兰人和犹太人共有的习性——他们觉得，除非夸大自己的中心地位，否则你始终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Europe）一书中，欧洲概览图便被调整到华沙刚好位居正中。而且事实上，在戴维斯有关欧洲的论述中，波兰成功地成为其自身历史和其余一切的中心。这在我看来显然是愚蠢的：波兰根本不是什么中心，而且在欧洲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也从未成为过中心。

但犹太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他们将自身的历史置于20世纪及其意义的中心。我们很难——尤其是在美国教书时——跟人清楚地讲明，大屠杀在“二战”中跟人们关切和决策的重心相距何其遥远。我并不是指它在当时不重要，更不是说它在今天不重要。但要想对不久前的过往做个公正的论述，便不能优先考虑我们自身的伦理或社群。残酷的现实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苦难和犹太人的灭绝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犹太人和纳粹除外）而言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

斯奈德：不过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波兰确实是一切的中心。就我们关切的犹太人的生存而言，欧洲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的中心显然在中西欧。接着发生了大瘟疫和对犹太人的驱逐，在这之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向东迁移到了波兰—立陶宛联邦（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帝国。最后是现代——我们可以说它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对波兰的瓜分——其结果是，生活在加利西亚的很大一部分欧洲犹太人第一次处在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秩序。他们的子孙迁往摩拉维亚（Moravia），并最终到达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创造了欧洲的现代主义。我们所一直讨论的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发明了许多我们正在使用的概念，所以在任何有关犹太人的融合、同化和对现代性的参与的讨论中，我们都不得不从波兰开始。

朱特：你若是将时钟停在1939年，那我没有可反驳的。这一叙事和其意义必须跟着一进程——以说波兰语的欧洲犹太人的都市化和解放为顶点——以及该叙事对整个欧洲的影响相匹配。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波兰被粗暴地挤出了画面：先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由于共产党的接管，接着又由于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一切的日益了解；对记忆的这种还原和对犹太人苦难回忆的日益敏感，不仅降低了波兰在犹太叙事中的地位，而且对其进行了负面的根本性重构。波兰，这一犹太人曾经的祖国，如今成为了犹太人毁灭的旁观者和偶尔的参与者。

在我看来，这一阴郁的图景笼罩着波兰犹太人的历史：它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可追溯到几个世纪

## 《思虑20世纪》

之前。如此所浮现的波兰——毫无疑问，这也是我自小在家中耳熟能详的那个波兰——是个对犹太人来说十分糟糕的地方。犹太人的历史由此成为了一个地理上获得解放的前瞻性叙事：逃离错误的地方和寻找更好的家园。在这一现代叙事中，更好的家园可能是西欧、加拿大、美国或更成问题的以色列。但它从来不是东欧。相反，错误的地方几乎总是位于一个真实的或（更经常地是）想象的东欧，它涵盖了从莱塔河（the Leitha）到布格河（the Bug）之间的区域。这一版本的犹太人受害的地理与早先的论述已如此彻底地叠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将它们分开。

斯奈德：我认为这完全正确。不过我试图要做的是将你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两条线索衔接起来，即地方性的东欧与世界主义的中欧。

我们再来看世纪末的维也纳那种静止的、跟不上步伐的犹太人生活的图景。这是我们在茨威格、罗特和休斯克那里获得的美丽肖像。你顺着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看取，你会看到某种有触感、坚固和连贯的东西，然后你等待它的破碎，因为你知道它就要破碎。蛋挞没有那么牢固和连贯过。这些犹太人跟摩拉维亚只有一代人的距离，跟加利西亚也只隔着两代人，因此离18世纪末毁灭的那个更古老的波兰世界一点儿也不远。

这一解释所做的是将19世纪末的那一代犹太青年给具体化，他们与其说继承了这个世界，不如说实际上创造了它。他们在暮年之时谦逊地将他们的成就归为历史的功劳，而不是抱怨历史破坏了这些成就。伟大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有关其20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你感觉就像悬在一个已遭毁灭的世界与另一个行将诞生的世界之间。

### 4、《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90页

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计划跟英国的比起来，更多的是指示性的，而更少管制性，它更关心的是努力将私人投资引向特定方向。法国的计划是集中化和指示性的，它尤为关心无须直接的强制实施而得到某些种类的产出。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政策要更为地方化，或得到地方化行动的支持。国有化在联邦德国远不如在英国那么重要。意大利人则借助庞大的伞状组织，如伊利（IRI）、埃尼（ENI）等，或南方基金（the Cassa del Mezzogiorno），来将公共资金引入特定的区域性目标。所以“计划”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含义。p390所以我们未来20年所面临的抉择并不是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或历史的终结vs.历史的回归，而是“基于集体目标的社会凝聚性政治”vs.“恐惧的政治对社会的腐蚀”。p428如果我们审视过去20年的历史，便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个关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停滞的故事，它被极少数人的非凡机运给掩盖了，因此平均下来仍显得像在持续增长。p429

### 5、《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47页

如果唯有犹太人能够识别彼此这一判断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必定长期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前提构成了挑战。毕竟，如果你可以去一个国家，在那里，久而久之，除非你希望他人知道，不然人们不会意识到你是犹太人，那么我们便已经实现了同化主义者的一个伟大雄心。在这一状况之下，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以色列？我那些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老师们对这些悖论有一个答案：即便异教徒喜欢你，将你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你也不会喜欢你。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你会更不喜欢你自己。你会找别的办法来申明你独一无二的犹太性。而同化的代价是，你所申明的犹太性是乖谬的、不健康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他们的道理。50年代的人宁愿继续睁只眼闭只眼……那时候以色列就像一个远方亲戚：你会充满深情地提到他，也会定期给他几张生日贺卡，但如果他来拜访你，并逗留过久，你就会觉得为难并最终懊恼了。

### 6、《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37页

20世纪的教训、记忆和成就是什么？哪些东西留存下来了，又有哪些需要挽回？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是，当代人和研究者们都认为20世纪如今已成过往：这是一份最好忘却的关于独裁、暴力、专制与



## 《思虑20世纪》

压迫的污秽记录。人们称21世纪会更好一些——即便只是因为它将建基于某种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一个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扁平的世界”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的话。

随着我们对话的展开，出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更狭义的“专业性”主题：一份有关两位历史学家讨论新近的历史，并试图在回顾中对其加以理解的记录。但另一系列的关切层出不穷：将20世纪置诸身后，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新近的过往中有哪些是最好被抛到脑后的，又有哪些是我们期望挽回并用于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这些都是更为介入性的论辩，在这里，当代关切和个人喜好都必然会闯入学术上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专业性更弱，但同样重要。其结果是一系列颇为热烈的交流：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了。

\* \* \* \* \*

本书“谈论”的是20世纪。但为什么是一个世纪？简单地将这一概念斥为老生常谈，并根据其他因素——经济创新、政治变革或文化变迁——来重订我们的纪年表，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有一点点不诚实。正因为它是一项人类的发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来编排时间在人类事务中至关重要。人们很看重转折点，结果这些转折点便赢得了某种重要性。

有时候，这纯属机缘巧合：17世纪的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转变，因为它恰好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时——在英国政治中，这是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是如此——1900年后不久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后者在位64年，并以其名字定义了一个时代——不过对法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世纪末（the fin-de-siècle）。

但即便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事后看来，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几乎总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点。当我们提到19世纪时，我们清楚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这正是因为这一时代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气质——并远在其结束之前便已如此。没有人认为，世界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么让他们的时代区别于他们18世纪先辈的时代——而这些区别对人们理解他们的时代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那么，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时为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

对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所做的这样一种可信概括，其问题恰恰在于，它们太执拗于人们在当时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

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

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60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

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1938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

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 \* \* \* \*

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足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当然，没有人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时而紧跟思想和学术的动态，时而与之偏离。由于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对我同时代左翼人士的狂热无动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两年时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让我只是间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热情的影响。我很感谢蒂姆揭示了这些变化：它们于我而言颇为朦胧，而且我承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剑桥——在观念史和英国史学史领域，这里是新学术的温床，但在当代欧洲史领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对法国史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结果是，我从未像那些跟剑桥的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过事的同龄人那样，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动地成为了我天然感到亲和的那一类人：对专业化的学院史学界来说，我差不多是个局外人。

这有一些弊端，正如从外部加入一群社会——学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其一是始终对“局内人”抱有一些怀疑，包括他们的文献、方法和传承的做法。这被证明在美国更为不利，在那里，专业上的因循守旧比在英国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问，对我年轻的同行们为之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诚自己从未听过：我从未借助“该领域的文献”来开展研究。相反，这些同行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读政治哲学，而我正式的“职位”却是社会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这让我很没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却成了一种骄傲。

回顾过去，我很高兴自己坚守历史的领地，而拒绝了从小到大各位老师劝我成为一名文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者的诱惑。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强调通过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当我最终找到时间来写一部关于我自己时代的叙事史时，我十分确信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确信。

一位在剑桥给我授过课的老教师曾因为我迷恋自然界和地质的构造（我当时正在研究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并对风景和气候的重要性很感兴趣）而对我横加训斥。“地理，”他告诉我说，“是跟地图（maps）有关。而历史是跟伙计们（chaps）有关。”这句话我从未忘记，既因为它不言而喻是正确的——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也因为如此明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实上，地图与伙计的区别，虽然不言而喻是真实的，但也是误导性的。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60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70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 7、《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69页

因此布伦特（Anthony Blunt）尽管是一名间谍、共产主义者、伪君子、说谎者和一个可能对英国

特工的身份暴露和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但在他的一些同行看来，他并没有犯下什么严重到可以正当剥夺他在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资格的罪行。那些在美国犯有为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罪的人所背负的污名，这些剑桥间谍从未背负过。……甚至正好相反，他们的行为在大众眼里已经被浪漫化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其英国统治阶级的出身而受到了保护。苏联间谍“剑桥五杰”（the Cambridge Five）在某种程度上幸运的是，他们无法战胜自己的出身，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生活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这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了间谍出生于英国之幸运，至少在20世纪是如此；与那几十年中的几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英国是一个可以对其进行背叛或批评的安全国家。智识上的介入，甚至在从事间谍活动时，所带来的风险似乎比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都远远要小。

### 8、《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40页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

### 9、《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97页

托尼·朱特谈历史与历史学家

1

斯奈德：我想问问你，历史知识和一种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历史的一个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错误。

朱特：事实上，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且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占领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究竟对历史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类比？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

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在这里，我担心的是“进步”史学的教诲。在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我小时候和我设想的你小时候——历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种连续而有条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个年代顺序——来学的。这一训练的目的在于给孩子们提供一幅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在时间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图。谁要是坚持认为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没有错。但用过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纠正的谎言和偏见——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见，是关于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谎言，等等——这样一种直觉，来取代堆砌史料的历史，则是一种更严重的错误。

你不能这么来教孩子们美国史：人们普遍认为内战跟奴隶解放有关，但哈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实际上完全是跟别的东西有关。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面面相觑，问道：“等等，她在说什么？什么是内战？它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打赢了？”

这些意在——我们可以大度些——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批判方法，其实是弄巧成拙。它们种下的是混乱而非洞见，而混乱乃是知识之敌。在任何人——无论是孩童还是研究生——能够沉浸于过往之前，他们都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前后经过和产生的后果。相反，我们却培养了两代彻底丧失共同参照系的公民。结果，他们对自身社会的治理做不了什么贡献。历史学家的任务——如果你愿意这样来思考的话——在于提供知识和叙事的维度，没有这一维度，我们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如果存在一种历史学家的公民责任的话，那么这就是了。

2

斯奈德：历史和记忆是否有亲缘关系？它们是盟友还是敌人？

朱特：它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因此，她们相互憎恨，但同时又有着足够多的共同点，使她们无法分离。而且，她们的争吵局限于一份她们既无法放弃又无法分割的遗产。

记忆更年轻，也更有魅力，她更容易引诱别人和被人引诱——因此她交游更广。历史则是姐姐：有点儿消瘦、朴素和严肃，她喜欢回避而不是参与无聊的闲谈。因此，她是一位政治上的壁花（wallflower），一本留在架子上的书。

如今，有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模糊和混淆了这对姐妹。比如，我想到一些犹太学者，他们援引犹太人长期以来对记忆的重视：记住（zakhor）。他们强调，一群无国籍者的过去始终有被他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加以记录的危险，因此记住过去是犹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话不错，我自己也颇有些同感。

但在这一点上，记住过去的责任和过去本身被搞混了：犹太人的过去和那些适用于集体记忆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因此，尽管有几代犹太历史学家的杰出工作，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选择性记忆（苦难、流放和受害）还是和对共同体的回忆性叙事融为了一体，并成为历史本身。你可能会惊讶于在我认识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故事”，这表现为，就算告诉他们关于美国、英国或法国的类似的神话，他们也始终不以为然。

这些神话如今作为对以色列国的公开辩护而被列进了官方记载当中。这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犹太式缺点：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小国，或像希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那样的现代巴尔干国家，都是在类似的神话叙事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这里所牵涉到的敏感之处在于，这使得还原真实的历史变得几乎没有可能。

但我深信历史与记忆之不同，也深信让记忆来取代历史是危险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记载，它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进行重写和重新检测，而记忆则适用于公共的、非学术性的目的：一个主题公园，一座纪念馆，一座博物馆，一幢建筑物，一套电视节目，某个事件，某个纪念日 and 一面旗帜。这种对过去的记忆性呈现必定是片面的、粗线条的和有选择性的；编排这些记忆的人迟早得告诉人们片面的事实，甚至是彻底的谎言——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不然。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不能替代历史。

因此，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里的展览并不是对历史的记载或为历史服务。它是被有选择地挪用的记忆，被应用于一个值得称道的公共目的。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会予以认可，但至于结果，我们就不要

自欺欺人了。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便容易遭到滥用。但如果历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记忆就有了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评判的模板和向导。那些对20世纪史有过研究的人可以参观一下大屠杀纪念馆，他们可以思考呈现给他们的都是什么，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对之加以评判，并带给其一种批判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该纪念馆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它将它所记载的记忆跟观众头脑中的历史并置在了一起。但那些仅仅知道正被展示的东西的观众便（且大多数时候如此）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切断了跟过去的联系，他们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一个他们没有能力做出评判的说法。

3

斯奈德：我想知道，是否历史学家的职责便在于拒斥那种彻底的行动自由的要求，这种自由事实上伤人伤己，并为政治上的不自由铺平了道路。有一些东西——即障碍——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像房间里的家具。

朱特：我不敢苟同。你我并不是给房间布置家具的人——我们只是给它贴标签的人。我们的职责是告诉别人：这是一张木结构的大沙发，而不是一张塑料桌子。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张塑料桌子，那么你不仅犯了一个分类错误，也不仅每回碰到它时都会伤到自己，而且你是在以错误的方式使用它。你会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很狼狈，而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如此狼狈。

换句话说，我深信，历史学家在这里并不是要重述过去。我们给过去重贴标签，不是因为我们如何看待“家具”这个门类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正在探讨的家具属于哪一类别有了一种更深的理解。一件被标为“大橡木桌子”的家具可能并不总是这样来标记。必定有那么一些时候，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另外的东西：比如橡木在过去可能是它如此毋庸置疑的那一部分，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橡木做的，没有人会专门提到。但现在，橡木更常被人谈到，因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材料。所以我们正讨论的是一张大橡木桌子，我们的职责便是标明重点。

斯奈德：我想你是对的，这是给家具贴标签。或者，它也许更像是通过留线索来开辟道路。你知道的，有点儿像在欧洲的公园里，这些路都是有指示牌的。有人已经过去了，他们在每第50棵树上标了个红色的叉或一个绿色的圈。如果你是顺着标有绿圈的那条路走，那你就跟着这些树，以此类推。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些树都一直在那里，但这些路却是被创造出来的：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路，也可能无路可走。但如果没有某条路，你就无法看见森林。一定要有人在那里标明去路。

朱特：我喜欢这个比喻，只要我们将其理解为是由我们来标明去路的话，但我们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它。

斯奈德：有无数条路可以通过这片森林，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有标好的，也有没标好的。过往塞满了东西。但如果你不找条路穿过它，而只是盯着地面寻找驻足之处，那你就没法欣赏这些树。

朱特：我可以卖弄一点儿说，我们应当这样来考虑：首先是教人们认识树木。要是人们不知道树是什么，他们就不应当踏进森林，即便有了已经标好的路。接着你教他们，许多树一起组成了一片森林。然后你教他们，看待森林的一种方式——但还有其他方式——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包含许多条路的地方。

接下来，在你承认还有其他路——尽管在你看来那些路不太令人满意——的同时，指明你（历史学家）觉得哪一条路是穿越这片森林的最佳路径。只有在那时，你才有可能自由地将这些路径给“理论化”：它们是不是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是否扭曲了森林的“自然”面目，等等。我的担忧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同行已对单纯的对树木的描绘感到厌倦了，他们从教导路的成因中得到了最大满足。

## 10、《思虑20世纪》的笔记-全文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瓦解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对决

凯恩斯：为获得稳定干预

哈耶克：经济计划导致政治独裁，不要干预 - - 》芝加哥经济学派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叙事中关键性因素“只要过程本身正确，结果必会成功

最先出现的是宪政、法治和分权。民主几乎总是最后出现

希腊人便知道，民主不太可能亡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或寡头政治的吸引力，而更可能亡于自身的堕落

知识分子是为了填补出现在民主的两个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空间

社会越是民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便越是有限。（小圈子）

福利国家构建的高明之处在于，主要的收益者是中产阶级

中国借钱给美国政府，维持美国经济的运转，并把美元塞进美国人的口袋，这样他们就能出去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了

## 11、《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07页

巴黎是清谈之所，而西班牙则是当去之处。跟许多最优秀的左派思想家一样，奥威尔和库斯勒都去了西班牙。但为什么西班牙在1936年变得如此重要？部分原因是，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个国家正依循着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模式：这是一个处在法西斯——或至少是反民主——力量威胁之下的民主共和国。在西班牙的例子中，我们所说的这些反民主的力量都是明显的反动派：军队、地主和教会。地主格外——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是合情合理地——感受到了获胜的人民阵线联盟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对中等规模的农场征收累进税，以及大谈土地集体化。这对南方新政府的支持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对中西部的小业主来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此在那些年里，将潜在的中间选民推向右派，左派负有部分的责任。但1936年西班牙的核心事实显然是那场针对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场相当传统的西班牙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军队跟以往一样，声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反对一个背叛了国家利益的政治阶级。但这一次，军队和政治家之间的内战被并入了一系列的国内冲突和地方内战，它们的每一方都因为跟国家层面的分裂的联系而被激化了。因此，西班牙的冲突变成了一场欧洲的思想、政治和军事的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外对它的重述：是共产主义反抗法西斯主义，工人反抗资本家，而非加泰罗尼亚反抗马德里，南方的无地工人反抗西部拥有土地的乡村中产阶级，或坚定信奉天主教的区域反抗大体上反教权的区域。西班牙共产党人自称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事实上他们起初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中央的共和军都竞争不过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切可用的支持，他们也就更处于下风了。

## 12、《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页

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

## 13、《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34页

你的参照系越是宏大，你所把握的细节和地方性知识就越为薄弱——这也是为什么探究事情原委的最佳人选通常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记者。你没法在成为一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的同时，仍希望保有常规的、实地（on-the-ground）的知识。但人们很难一直对缺少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予以尊重：他们迟早会在自己的主题上原地打转——哪怕是找一个超越于它的视角也好。总之，无话不谈者会面临无力谈论任何话题的危险。智识活动跟诱惑有点儿相像。如果你直奔目标，几乎肯定不会成功。在大多数地方，令人不快的真理通常是，你被骗了。而知识分子的职责便在于揭示真相；揭示真相，然后解释为何它就是真相。调查记者的职责在于揭示真相，知识分子的职责则在于，当真相尚未揭开时

## 《思虑20世纪》

，解释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将知识分子视为启示者的危险在于，我们会再次向他们乞求宏大叙事或大道理。而道理越是重要，叙事越是宏大，他们便看起来越像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那类启示性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p345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但那是因为我们是从经济上而非政治上来思考。因此，我们不太清楚如何来应对那些明显不是由全球化或经济所塑造的行为。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全球化最弱的。它最不容易受国际性交流、民族的国际性流动，甚或货币与贸易的国际性转移的后果的直接影响。p357社会越是民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便越是有限。p365

### 14、《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88页

P188页谈到权力

斯奈德：法西斯主义者可能是最后的相信权力之美的人。

朱特：的确，对他们来说权力是美的.....但我想知道，对非欧洲的世界来说，你的判断是不是对的。想一想一些国家，有最明显的例证。

原文最后一句为：Think of China, after all, the most obvious case in point.

斯奈德：恐怕是一个极佳例证。

原文为：I fear that China is an excellent case in point.

### 15、《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6页

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些成对的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简化为某种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说将它们都简化为某种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着多种探究真理的方式。这便是多元主义：它不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相反是其反义词。多元主义接受不同类型的真理的道德实在性，但拒斥这一观念，即它们能够用某种单一的尺度来评判，用某种单一的价值来衡量。

### 16、《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38页

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

### 17、《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16页

1917年之后，共产党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世俗斗争及其有益的社会或美学后果的深切迷恋。特别是法西斯知识分子，他们将死亡同时作为战争和国内暴力的正当理由和



## 《思虑20世纪》

魅力所在：从这样的混乱中将诞生一种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我们开始庆贺自己说出“再见了，这一切”之前，一定要记得，这种浪漫的情感绝没有被我们抛诸身后。他人的苦难再一次被证明是形成一个新世界的历史方式，并从而为那些不然将不可原谅和难以解释的事件赋予了意义。如果一位保守的美国国务卿在21世纪还可以诉诸这一番托辞，那么为何欧洲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前援用类似的理由？

### 18、《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43页

美国重回孤立；英国变成了半孤立的国家；西班牙在内部瓦解；意大利处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而德国则陷入了纳粹主义；法国是欧洲硕果仅存的民主力量。斯奈德：法国人唯有在人们倾听他们或不倾听他们时才显得重要。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